

## 赤心报国终不悔:

## 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先驱——丁文江

□ 龙悦

丁文江(1887—1935),出生于江苏泰兴县的一个绅士家庭。

1901年丁文江15岁时,他想报考上海南洋公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维新”时代,“戊戌维新”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思想却在中国广为传播。时任泰兴知县的龙研仙是“新学”的倡导者,他对丁文江的才华大为叹异,收其为弟子。从此,丁文江从师于龙研仙研习“新学”。

龙研仙力劝丁文江的父亲将丁文江送到外国去求学。并托湖南的好友胡子靖带文江到日本去,遂使丁文江父亲“举债以成其行。”

## 留学生涯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留日学生便无心读书了,丁文江在同盟会会员吴稚晖支持鼓励下于1904年3月和二位留日学生乘船返回上海,并从上海踏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当他们3人上船时,身上只剩下十几个英镑,就这样开始了赴英国留学的艰难旅程。

途中,丁文江一行上岸拜访了康有为。康有为勉励他们努力学习,送给他们十几个英镑,帮助他们摆脱困难,并请他们带一封信给他远在伦敦的女婿罗昌,让罗昌帮助他们。罗昌从伦敦给他们寄来了一些钱,解决了他们不少困难。

后几经周折,1908年,丁文江考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专习动物学,并以地质学为副科之一。1911年,丁文江动物学和地质学双科毕业。

1911年5月,丁文江经越南海防港,由通车不久的滇越铁路到达了红河右岸——对岸就是中国的云南省。

## 培养中国的地质人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丁文江回到了家乡泰兴县。1912年,丁文江赴上海,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在这一年中,丁文江除了教授动物学外,他还用生物进化的观点写了一部“动物学教科书”,并以此作为教本。在假期丁文江

还到芜湖下游扬子江流域进行了地质调查。

1913年2月,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张轶欧邀丁文江到北京工商部去工作。张轶欧是一位颇有远见的人,他认识到地质学的重要性,而当时国人对地质学的重要性毫无认识。丁文江到北京后被任命为矿政司地质科科长。丁文江利用地质科科长的便利条件,开始培养地质人才为创办地质调查所创造条件。

当时的中国人对地质学并不重视。清末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曾开办了地质学系,但徒有虚名,竟招不到学生。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易名为北京大学,因为招不到学生,校方将地质学系停办了。丁文江利用北京大学停办地质系的机会,把北大地质系的图书和标本借了过来,在工商部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这个研究班后来改名为地质研究所。

从1914年起,丁文江又亲自教授古生物学。自此以前,中国很少有学校开设古生物学课程,丁文江在地质研究班亲自讲授古生物学,开创了中国人自己教授古生物学的先例。

丁文江在地质学方面有一套自己的教学方法。他认为要使学生能独立去工作,必须给他们许多机会,把学生分为若干小组,独立去工作。教授的责任在于指出应解决的问题,审定学生们所用的方法和所得出的结果。他不但这样要求学生,而且以身作则,每当率学生外出调查,他总是登山必到顶峰,行进必须步行。

1916年,地质研究所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的著名学者,其中有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等。从地质研究所毕业的人,有些进入后来的地质调查所担任各地的调查工作,有些成绩优异者被分别选送国外去深造。

同年,北京大学重开地质学系,负责培养地质学人才,而农商部将地质研究所交归北京大学,农商部另成立地质

调查所,负责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地质调查所的创立,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丁文江不但是地质调查所的第一任所长,而且是最初负责筹备创立的人,丁文江对地质学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美籍专家葛利普在谈到了丁文江对地质学的认识时说:“丁博士心目中的地质学极为广泛,范围所及构成地球的材料,如矿物及岩石等,且包容形成及改动此种材料的种种动力,以及其渐渐演变之程序,进而对于地球之形状构造及经过历史等,全部作为研究之对象,更涉及自古古以来,地球陆面以上以及海水之间的生物,各种生物演进之程序,及足以影响其发展、分布之各种因素。如地理、气候,均在范围之中。”丁文江为地质调查所描绘的蓝图,正是根据他对地质学的这种认识来培养人才、延揽人才和从事调查研究的。

丁文江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前后不过6年,在这6年中,他对地质调查所的最大贡献就是基于他对地质学的全面认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地质调查所办成了一个纯科学研究机构,并使地质调查所创办的《中国古生物志》在不长的时间里成为全世界有名的科学刊物。其次,地质调查所不但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研究体系,并且领导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研究中心。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就是地质调查所在调查中首先发现的。北京周口店附近的系统发掘,以及后来陆续发现的“北京猿人”也是由地质调查所组织和牵头的。

地质调查所在纯科学的研究工作之外,还顾及到国家的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事一些矿业、石油、土壤等实用方面的研究工作。丁文江本人就曾参与了龙烟铁矿厂的设计和北票煤矿公司的开办工作。此外,地质调查所还设立了地震台、燃料研究室和土壤调查所等等,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

(连载一)

见证中国“航海日”的  
郑和航海600周年纪念邮票

□ 汤云明



郑和是云南晋宁人,也是从滇池走出去的海上巨人。他一生历经28年七次下西洋,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外交、经济和文化交流。

郑和(1371—1433),本姓马名和,小名“三保”,回族,生于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区昆阳街道)。由于在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变”中有功,被朱棣提升为内官监大监,并赐姓“郑”。郑和是世界航海先驱,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他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元代以今南海以西海洋及沿海各地称为西洋),传播了中华文明,引进了西洋各国的文明成果,为中国与世界的交往和交流作出了贡献,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1405年7月11日(农历6月15日),郑和正式受命出使西洋,他率领着明朝的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发,开始了航海行程。在随后的28年里,郑和率领由208艘船舶和2.78万人组成的船队,以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概和开放进取、海纳百川的胸怀完成了七下西洋的伟大创举,经东南亚、印度洋远航至非洲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行程达到近30万公里。郑和的和平之旅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时间最早、规模宏大、技术先进、活

动范围广的洲际航海活动,堪称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先驱。郑和七下西洋,传播的是中华民族的科学技术,撒下的是文化和文明的种子,架起的是与世界沟通的友谊桥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既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也是全人类的自豪。

为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我国确定从2005年开始每年的7月11日为中国“航海日”,宣传普及航海及海洋知识,弘扬郑和精神,广泛开展“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教育,增强全民族的航海意识、海洋意识,树立蓝色国土观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云南昆明市晋宁区也决定在每年7月11日举办“郑和文化节”,以纪念和继承郑和下西洋所体现的“热爱祖国、睦邻友好、科学航海”的伟大精神。

与此同时,国家邮政局于2005年6月28日发行《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三枚,面值共2.40元,发行邮票小型张一枚,面值6.00元,邮票图名分别为:郑和像、睦友好、科学航海、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为庆祝该套邮票在郑和故乡——云南晋宁隆重首发,云南省集邮公司特发行云南晋宁分会场首发纪念封一枚,纪念封图案为“郑和公园大门”与“郑和塑像”,并发行原地纪念封一套二枚,以资纪念。

在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有一处革命旧址——“师家商铺”,它位于紫坊畔乡刘坪村,在二将川川掌两水交汇处,三面环水,背靠大山、易守难攻,地理位置特殊,是连接陕北、宁夏、关中的商旅要冲,也是陕甘时期“南梁集市”的雏形。从1928年3月开始,“师家商铺”先后有3任大掌柜,他们一直秉持着“买卖公平、诚信经营”的祖训,在甘肃庆阳、陕北定边、宁夏吴忠等地颇有声望,皆有商务往来。

民国初中期,整个西北大地连年干旱,兵匪横行,民不聊生。1928年,邻省陕西靖边县的师成方举家逃荒,最终落居于华池县紫坊畔乡刘坪村。由于当地处于偏远山区,山大沟深,梢林茂密,交通不便,经济贸易的自然环境受到限制,布匹、纸、油墨、糖、盐等生活必需品十分奇缺,却又盛产羊皮、羊毛、山货、杂粮等土特产。

既然不能聚集在一起进行经济贸易,那为何不在家中进行简单的贸易活动呢?头脑灵活的师成方这样想。于是,他便想方设法从外地和不远的驿马、西峰等地白区商人手中购进布、纸、油墨、糖、盐等物品,调剂余缺、互通有无,进行了最为简单的“物物交换”贸易活动,当地人称“师家商铺”。“师家商铺”开张不久,即接受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道理,从此,“师家商铺”走上了为陕甘革命胜利做贡献的道路。

在“师家商铺”的发展进程中,不得不提到食盐的运输。当时,敌人死卡边区,禁止棉花、布匹、日用百货等运入根据地。但是,敌占区同样也缺少食盐,对食盐运输可以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尤其对驮盐的商人来说,只要给点“好处”就放行。于是,“师家商铺”便鼓励高咀子、三里畔、刘坪、山庄、白杨树湾等附近的穷苦百姓和敌占区针锋相对,发挥食盐的优势,当地一些人迫于生计,自愿结伙组成驮盐队,到宁夏盐池和陕北定边去驮盐。这一方面可以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可用食盐从国民党统治区换回大量布匹、棉花和日用百货,从而打破封锁,活跃边区经济。

曾经有一首广为传唱的《信天游》和《驮盐歌》,《信天游》这样唱道:“细溜溜的北风经常吹,亲哥哥我驮盐真受气;翻山越岭过峁峁,羊肠小道走不完。”《驮盐歌》这样唱道:“吆上毛驴走定边,去驮盐,驮回盐,我南梁集市卖,挣下银钱喜开怀,店铺串了七八家,心爱的杂货都治下,全家老少有吃穿。”歌中提到的“南梁集市”,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1934年7月在荔园堡设立的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集市,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倾注了80多年前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和汗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不断对集市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期间,白马庙、刘坪等地都有了集市贸易。尽管敌人曾多次扫荡,给“师家商铺”、白马庙、刘坪等地带来了一定灾难,经济贸易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政权一旦回到人民手中,集市贸易依旧很活跃。“师家商铺”早期的贸易活动,对“南梁集市”的设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1928年,刘志丹、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开始在这里传播革命真理。1929年,高岗和陕甘边的红军将士们以“师家商铺”作为掩护,以商队和商人等身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33年,正值南梁苏区创建之际,思想进步、支持革命的师玉生接任了“师家商铺”第三任大掌柜。在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的亲自领导下,他更以经商作掩护,将“师家商铺”作为一些重要物资的“转运站”,给南梁苏区买马贩畜、转输物资,为解决军需民用做出了重大贡献。高岗曾为其题写“师家商铺”匾额。

1934年七八月间,在我党的秘密推动下,社会各界在刘坪进行了两次为期20多天到一个多月的物资交流大会,有力推动了边区贸易的繁荣发展。习仲勋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刘坪物资交流贸易大会开幕式,在大戏台子上,做了以边区政府鼓励大力发展边区商贸、坚决保护商队和商客利益为主要内容的讲话,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



## 陕甘边区「师家商铺」

『红色商栈』

□ 刘志洲

1934至1935年,“师家商铺”已经发展到用斗量银子的大宗交易规模。陕甘边区逐步形成了以“师家商铺”为核心,方圆数百里的刘坪集市,一月三次,逢八是集。“师家商铺”的发展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粮食、牲口、猪羊、布料、棉花、食盐、药材等急需物资,并使陕甘党组织以此作为掩护,秘密藏匿、转运我党重要物资,成为陕甘红军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从1929年至1952年,“师家商铺”一直或明或暗地担负了红军、八路军及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的各个时期,我党和政府物资收购与储藏等重要职能。高岗和习仲勋都曾挂名“师家商铺”的“高掌柜”和“习掌柜”,刘志丹等陕甘边红军的官兵和家属也经常以赶牲口的掌柜和伙计等身份为掩护,到“师家商铺”里修整养息。可以说,师家商铺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发展、为迎接中央红军到陕北、为我八路军整编奔赴抗日前线,包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党的事业,在物质准备等方面做出了特殊的非常重大的贡献。

当时,边区政府对往来“师家商铺”和“南梁集市”的白区商人,采取欢迎、争取和保护的政策。对于比较开明、愿意和边区做买卖的白区商人,发给票证,到了边区各检查站口,只要出示票证,就可以顺利通过。为了激发白区商人与苏区做生意的积极性,根据地的牛羊和木耳、药材、木材等山货,廉价卖给他们,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久而久之,一些白区商人便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渐靠拢革命,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所痛恨的“通共”分子,有的甚至冒着被杀头的危险给根据地输送货物。

起初在交易的过程中,边区不使用国民党的法币,这对经济贸易极为不利。原因是国民党的货币贬值快,也许今天还能正常使用,明天就变成一堆废纸了。为了促进苏区经济的发展,加强金融管理,稳定物价,边区政府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的“油布币”,一元苏币兑换一块银圆,在国民党货币严重贬值的情况下,苏币却很稳定,在商人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吸引了白区商人来苏区做生意,一些开明商人与根据地建立了长期的贸易关系。为了打消群众和商人的顾虑,边区政府还设立了兑换处,群众和商贩可以随时拿着银元和“油布币”互换,“油布币”币值稳定,面额实用且携带方便,很受群众认可和欢迎。这些,都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金融管理,稳定了物价。

2014年春节,高岗的夫人李力群专程来这里,参观了“师家商铺”后,即兴题写了“师家商铺革命旧址”。